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西班牙〕门多萨 撰

何高济 译

中华大帝国史



中华书局

名著译丛

中华大帝国史

〔西班牙〕门多萨 撰

何高济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大帝国史/(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3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ISBN 978 - 7 - 101 - 09217 - 2

I. ①中… II. ①门…②何… III. 中国历史 - 古代
史 IV. 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3886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华大帝国史 |
| 撰 者 | 〔西班牙〕门多萨 |
| 译 者 | 何高济 |
| 丛 书 名 |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
| 责任编辑 | 谢 方 齐浣心 孙文颖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 1/8 插页 2 字数 267 千字 |
| 印 数 | 7001 - 10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9217 - 2 |
| 定 价 | 43.00 元 |
-

中译者前言

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 年首版于罗马,内容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记中国的事情及中国的历史;第二部分包括三个传教士的中国行纪及环球行纪。这部著名史书,虽然有许多欧洲文字译本,但仍缺乏一个对所述内容有详细解释的本子,也缺乏对门多萨引用的史源的说明。我在译完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 1990 年出版)后,再译门多萨的史书,自然发现门多萨和葡萄牙人克路士和西班牙人拉达记述的相同处和那些歧异的地方,由此引起我对他引用的史料作出探索。

首先,门多萨有的章节完全或大部分采录自上述两位作者,这一类比较容易辨识。但在文字上常有所改动,有时还有增添。举一个例子。克路士记中国的物产说:“有一种许多果园都产的水果,结在树叶粗大的大树上,这种水果大如圆李,稍大些,去皮后就是特殊的和稀罕的水果。没有人能吃个够,因为它使人老想再吃,不管人们吃得不能再多了,它仍然不造成伤害。这种水果有另一种小些的,但越大越佳。它叫做荔枝(Lechias)。”这是我所能查到的欧洲对我们南部这种特殊水果的最早记载。门多萨采用了这个记载,把它改写成:“他们(中国人)还有一种叫做荔枝的果子,十分好吃,尽管大量地吃,却从不伤身体。”而有不少章节,几乎都是据克路士和拉达重新编写。

不见于上述两位作家文字的,门多萨书还有两个来源。据博克舍的研究,拉达本人写过不止一份报告,其手稿在门多萨时代尚存;和拉

达同行的军人洛阿卡也有一份行纪,这些资料都曾被门多萨利用。另外,门多萨见过另一位和拉达共同出使福建的修士马任,得到不少口头资料,可能还有门多萨在墨西哥打听到的有关中国消息。这一类增补的内容,在许多章节中可明显看出。例如,谈中国古史部分,门多萨比拉达的要详尽得多,还有记大明的赋税、军队等也是如此。在谈授予“学位”时,拉达现存记录很简单,只说“他们在他耳上戴两朵银花,让他骑马簇拥着穿过城镇,前有旌旗和乐人。我们在福州看见这样一个人,他是个贵族青年”。门多萨则明确说:“我在这里将谈谈修士马丁·德·拉达及其同伴在福州城眼见他们授予学位的情况……”,并且有很详细的长篇报道。我们不能断定,他增添的内容,究竟是据拉达的其他手稿,还是根据马任等的口头材料编写而成。

除开当时人的资料外,门多萨还利用过前人的记录。第一章对中国概述,有不少地方是依据马可波罗行纪,特别有关鞑靼人的记载,整段采自这部13世纪的著作。葡人巴洛斯的《亚洲志》又名《十卷书》也可能为门多萨所采用,有的叙述,字句几乎完全相同。如谈中国的道里,门多萨说:“根据所说的书籍(即携进马尼拉的中国书),可看到中国人自己只有三种长度单位,用他们的话说叫做里、铺和站,实际犹言一飞朗、里格,或程。所谓里的长度,相当于一个安静的日子,平地上一个人使尽气力呼叫所能听到的距离,10个这样的里是一铺,那是一个大西班牙里格,而10个铺是一天的路程,那叫做站,相当于12个长里格。”巴洛斯的记载是:“他们(中国人)的第一个和最短的单位是里,它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在平地上,一个平静日子喊叫所能听到的,十个这样的里是一个铺,相当于一个西班牙里格,由此十个铺是一个人的日程,他们称之为站。”这个记载,不见于现存拉达手稿,到底门多萨是据巴洛斯,或是如他所说是据中国书籍?巴洛斯自称他也得到一些中国书,叫

一个中国人译出,但我们不能断定他们是否都引自同一本中国书。在谈中国长城的地方,门多萨说长城始于 Ochyoy,这个地名不见于拉达的记载,但见于巴洛斯的《亚洲志》,其中写道:“在 43 度和 45 度有一道城墙,它始于西方一座位于两条极高山岭之间的城池,名叫 Ochioi……。”从著录的名字(Ochyoy = Ochioi)相同看,有理由说门多萨实际摘录的是巴洛斯的记述。

门多萨本人没有到过中国或亚洲,他的书是编写而成,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由于缺乏亲身感受,有的地方出现疏漏或者错误。例如,记中国的都城北京和南京,门多萨把二者都说成是靠近鞑靼,而不像他的前辈克路士和拉达如实地把它们置于一南一北。中国人使用筷子,拉达有准确的记录,门多萨似乎不能理解,倒说中国人吃饭用金银制的小叉子。在记中国神话中,拉达说:“他们说天、地和水自太初以来就结合在一起,一个叫太一的把天地分开来,随后又诞生了一个叫盘古的人,既不结婚又无子女。”门多萨则说太一既创造了一个盘古,还创造一个叫盘古娜的女人,把他们说成像是亚当和夏娃,符合上帝创造一男一女的传说。有时门多萨离开他的前辈的地方,错误因之产生,但他的前辈记录本身有误,门多萨也随之发生错误。

目前这个本子是译自派克英译《中华大帝国史》(1588 年,伦敦),由斯汤通编,麦术尔作绪论,1853 年、1854 年版。1940 年北京版题名为:《中华大帝国史》,曼特刹著,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影印。

本书部分译稿曾参看杨钦章先生的几章译稿,全稿并蒙谢方先生审读,改正了译文中的一些错误,张铠先生又用西班牙文本作了部分校正,俞素娥女士最后对全文誊清抄正,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何高济

1991 年 7 月 8 日

绪 论

麦术尔

值此重印派克同时代所译门多萨有趣的和现已罕见的有关中国的记述,并将它呈献给哈克鲁特学会会员之际,本编者认为应向他的读者说明一下原书是在甚么情况下编写的,同时应指出原先传至欧洲的有关这一著名国家的报道过程。这一报导的意义,已充分表现在它对中国人这样一个特殊民族生活习惯所作的具体入微的记述上,无需加以解说;而使那些赞赏本会宗旨的人感兴趣的将是得知本译本是在门多萨原西班牙文本出版后不久,由哈克鲁特亲自提议作出的。

哈克鲁特学会的主要宗旨是探索地理考古,而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英国前辈在推进这门重要学科中取得的进步。为追求这个目的,所以,门多萨的中国记述作为迄今用英文刊布的关于中国最早而详尽的记载,被选来重新出版。我们说“详尽的”记载,因为我们必须不要略而不提在它之前已有一篇短而有趣的文献,由李查德·埃顿(Richard Eden)刊行在他的《东西印度群岛旅行史》中,题为“中国省的报道”,其内容和史实我们将在下面适当的地方叙及。那么,不管怎样,在作重版选择时,注意到用我们自己语言出版的早期记载的同时,介绍一下可能时时出现在其他语言中的以前记述,将加深读者对这个题目的认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因地理位置和人种特点而远离(欧洲)文明世界,仍然在智力和道德两方面进展中又惊人地领先于其它的国家,即使是欧

洲所获得的那些早期朦胧的消息而言,这个计划格外值得期望。同时,在这样一篇介绍中,我们主张略而不论争议甚多的问题,如埃拉脱斯提涅(Eratosthenes)、斯特拉波(Strabo)及《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的Thinae的位置,或托勒密(Ptolemy)给我们保留的马利奴斯(Marinus)Serica之应用于中国。对这些甚不明确资料,我们将不再论述,而仅仅提到,我们自己的意见与弗修斯(Vossius)的相一致:中国所指的是一个国家,而且阿米亚奴斯·马赛里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Seres,和现代中国人的情况极相似,意指该民族。罗马人有些对中国的知识,看来由有学识的德·基尼(De Guignes)在中国史书中所作的发现予以证明:在基督166年,安敦的一个使节据说从海道抵达延熹帝廷,还有荷拉西(Horace)和普鲁柏蒂乌斯(propertius)提到的serica oestis,也证实这个看法,其真正所指的商品仅仅是丝,而不是棉布。

总之,如我们所说,对这些不那么明确的地方,我们不愿论述。因此我们往下谈更明确而无疑问的记录。其中头一个是一份阿拉伯文手稿中的记载,约写于1173年,记述两个阿拉伯商人的观察,从文件的体裁看,他们显然在两个世纪前到过中国。确实,其各自的日期被断定为851和867年。这份稀罕珍贵的手稿,由有学识的欧舍比·雷脑多特(M. Eusèbe Renaudot)在孔德·德·舍涅来(Comte de Seignelay)图书馆发现,经他译为法文,1718年刊行于巴黎。英译本出现在1733年。虽然直到晚近日期它才为欧洲人所知,这是作为我们迄今所接受的消息中两个最早的中国记,它当然有其地位。尽管掺杂了一些夸大之词。及明显的传说,它们仍包含了很多稀奇的情节,即使在今天,从中国的制度和风俗的持久看,可以认为是正确的,肯定可以信任其报道或撰述的真实性。

这两篇报道是连续写成,其中一篇构成另一篇的一种注释或补充。

中国被描写得是广阔的,但是,虽然人口更多,却不及印度大,而且分为许多侯国,它被说成是肥沃的,没有荒漠,而印度则据说有些大沙漠。

称作 tcha 的茶,明显地被提到,当作是加进热水中的普通饮料,并且被认为可治百病。

提到瓷是一种用以制作如玻璃般精细透明器皿的优质泥土。

中国人被描写为比印度人更漂亮,并且“冬夏皆穿丝绸,这种衣服对王公、士兵,及一切其他人,哪怕最低层人,都是共同的。在冬天他们穿一种特制的,垂到脚上的裤子。如有可能,他们在一条裤上再穿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或更多的裤子;并且十分注意地包严,下包到脚,因为他们非常害怕潮湿。在夏天他们只穿一件丝袍,或这类服装,但没有头巾。

“他们的普通食物是大米,常就着肉汤吃,像阿拉伯人用肉或鱼做的汤,他们用来浇在饭上。他们的国王吃小麦面包,及各种动物,猪肉不除外,还有别的东西。

“他们有好多多种水果,苹果、柠檬、榲桲、甘蔗、柑橘、无花果、葡萄、黄瓜、产食物的树、核桃、榛子、阿月浑子、李子、杏、services〔樱桃〕和椰子,但他们没有大量的棕榈;他们仅在私人家里有一些。

“他们的饮料是一种用米制成的酒;他们国内没有其他的酒,也没有运输给他们;他们不知道它是甚么,也不喝它。他们也有醋,和一种类似阿拉伯称作纳提夫(Natef)的糖果,及一些其他。

“他们在卫生方面不很讲究。他们也吃死的动物,在很多别的事上像祆教徒那样做;不过,确实的,两者的宗教都很相同。中国女人不戴面纱,用小的象牙和其他梳子理头,有时她们要一次用二十把。男人戴特制的帽子。他们擅长机械,但不知依赖数学的技艺。”

谈到读和写的知识说,在他们那里是普遍的,所有重要的买卖都见诸文字。提到偶像崇拜很盛行,有一段可怕的和费解的文字说,人肉公开地摆在市场上售卖。同时惩处邪恶极严厉,对个人的监督极端严格,“因为在中国每个人,不管是本地人、阿拉伯人,或任何其他外国人,都被迫供出他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因这样做得到宽恕”。盗贼一被抓住就处死。

广府(Canfu)(广州)被说成是中国的海港,阿拉伯船只常去之处;而京都(Cumdan)被描写成一个极繁华的城市,是君王的驻地^①。

雷脑多特,世人应感谢他把这份记述从湮没中拯救出来,认为它为12世纪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爱德利奚(Edrisi)提供材料编写其《努比亚地理志》(Geographia Nubiensis)中关于中国的情况;但这个说法看来没有根据,因为他的情节太少而且不清,难以得出结论,说那是采自我们提到的更清楚和丰富的记载。爱德利奚供给我们的最显著的消息,是这件事:中国(Sin)的北部当时被一支他称作巴哈格尔突厥人(Baghargar Turks)的鞑靼人所征服。将近两个世纪后出现的阿布肥达(Abulfeda)看来同样不知道这两个阿拉伯旅行家的存在。因为他替当时地理学家不了解中国辩解说,没有人曾到过那里,以致他们能从中取得情报。

一个12世纪到过东方的犹太旅行家,士代拉的班哲明(Benjamin of Tudela),他对中国的附记不应被忽略。这仅是个附记,但稀奇到值得引述。它内容如下:——

“从那里[罕得(Khandy)岛]到中国有40天旅程;这个国家在东方,有人说猎户星(Star Orion)照耀着它四周的海,而这海叫做尼克法(Nikpha)海。此海有时掀起猛烈风暴,以致海员不能驾驭他的船只。遇到风暴把一艘船抛进此海,就不可能驾驶它;船员和乘客用完他们的

粮食,然后悲惨地死去,很多船只就这样丧失。但人们学会用下述方法救自己出这种危难。他们随身带牛皮,当这风暴起来把他们抛进尼克法海时,他们把自己缝在牛皮中,小心地手拿一把刀,并且在防备海水侵入后,他们投入洋中。这里他们马上被一种大鹰叫做格里芬(griffin)的发现,它把他们当作是牛,飞下来,用爪抓起他们,带到陆地,把捕获物放到山头或山谷,好在那里享用它的猎物。然后,人们利用刀子,从牛皮里爬出,马上把鸟杀死,再设法到达有人烟之地。很多人用这法子获救。”

由一位旅行家根据传闻所描述的首次欧洲对中国的报道,是一个教士柏朗嘉宾的约翰(John de Plano Carpini)作出的,他和另五名同会兄弟,在1245年,被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派往蒙古人的国土。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如有可能,把这些进行破坏的征服者从欧洲引开,劝诱他们转而跟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进行战争。同时他们要尽可能的宣讲基督教,总之要收集有关这一鲜为人所知的民族的一切可能的情报。

嘉宾离开了十六个月。他撰述的一个抄本,以前属于卢门莱伯爵(Lord Lumley),现在大英博物馆,也是哈克鲁特在他的《首要航行纪》(Principal Navigations)中所使用的那本,下面的摘录系从中引用。在叙述了蒙古人和中国人他称之为契丹人之间的战争后,他对后者的描绘如下:

“契丹人是异教,他们自己有一种特殊的书写法,而(据称)有旧约和新约的圣经。他们在史书中也记录了他们祖先的传记。同时他们有修行的人,还有些像我们教堂形状的房屋,那是他们在那些日子的常去之处。他们说他们也有各种圣人,崇拜一个神。他们礼敬我主耶稣基督,相信永生之事,但没有受洗。他们也体面地尊崇我们的《圣经》。他们

喜爱基督徒,给予大量施舍,而且是非常有礼貌的文雅民族。他们没有胡须,面容形状部分跟蒙古人相同。人类的所有行业中,全世界都没有比之更好的工匠了。他们的国家盛产谷物、酒、金、丝,及其他商品。”

欧洲接受到的,根据个人经历采集有关中国记述的头一个旅行家,是威廉·凡·鲁布鲁克(William Van Rubruqui),以德·鲁布鲁克(De Rubruqui)之名著称,一位教士,有时叫做的黎玻里的威廉,因为他的行纪是从的黎玻里转交给法兰西王圣路易士的,行纪即奉他之命而作。他出使的原因在于传遍欧洲的一个谣言,说蒙古王蒙哥汗已归信基督教;圣路易士当时正对撒拉逊人进行第四次十字军远征,切望跟同时在波斯一侧对同一势力敌对的鞑靼人结成同盟。这一政治目的,因乐观地希望鞑靼人当时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归信基督教而得到加强。鲁布鲁克的路线是,经君士坦丁堡过黑海,穿过克里米亚,到达蒙哥当时的驻地,戈壁沙漠中哈刺赤(Caraci)城地方。

他开始受到的接待不很殷勤,但他到达后九天,他成功地得到皇帝的接见;当蒙古可汗不久后赴哈刺和林,鄂尔浑河东岸的一座城市,他和他的同伴也随同去。这座城市,几个世纪来没有在沙漠中发现其遗迹,只有马可波罗提到它,他在鲁布鲁克之后约18年访问了它,那是这些鞑靼人所定居的第一座城市,当时蒙古汗的都城,亚洲东部唯一的要镇。鲁布鲁克描写它说:“其中有两条大街,一条是撒拉逊人的,那里住着出家人并且很多商人会集;另一条街是契丹人(中国人)的,他们全是工匠。”对此的解释是,鞑靼人已征服了当时称作契丹的中国大部分北方地区。

到这个时候获得汗垂顾的鲁布鲁克及其同伴,极荣耀地进入哈刺和林。他描述该城比不上巴黎附近的圣丹尼斯村,他肯定说其修道院“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还要更大”。该地有土墙围绕,有四道门。有关

宫殿的描写给人印象是一座大厅，一头是为汗准备的坐位。他“像神明一样高坐”在上面。在这座城内，这位教士惊奇地发现一个法国工匠，叫做纪尧姆·布昔尔(Guillaume Bouchier)，早期的作家时时称之为巴黎的威廉，他制作了一件机械。考虑到他工作的时间很早，机械的精巧值得高度赞扬，因此普察斯对它作了描写，见于他的《朝圣者丛书》第三卷中鲁布鲁克行纪的大部译文内。

“巴黎的匠人威廉为他(汗)制作了一株巨大的银树，在它的根部是四只银狮，各通有管道，喷出白色马奶。树内有四根管子，通到它的顶端，在顶端再向下弯回，每根上还有金蛇，蛇尾缠绕树身。一根管子流出酒，另一根流出哈刺忽迷思，即澄清的马奶，另一根流出布勒，那是一种用蜜作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米酒，叫做特拉辛纳的。树根各有一特制的银盆，接受每根管子流出的饮料。顶端这四根管子之间，他制作了一个手拿喇叭的天使，而在树的下部，有一个窟窿，里面藏有一个人。有一根管子从树心通到天使。最初他做了一只风箱，但风力不足。宫殿外有一个储存饮料的窖，那里的仆人听见天使吹喇叭的声音，便准备把饮料倾倒出来。树有银枝、叶子和果实。每逢饮宴的时候，大管事就命令天使吹喇叭。这时那个藏身于窟窿里的人，一听见命令，马上拼命往那根通向天使的管子送气，天使就把喇叭放到嘴上，大声吹响喇叭。于是窖里的仆人听到喇叭声，把不同的饮料倾入各自的管道，从管道流进准备好的盆中，管事再取出送给宫里的男男女女。”

鲁布鲁克收集到的有关中国人，即长期称作契丹人的种种情报中，有如下的重要事项。他们宗教和政治信条的特有原则，体现出存在着一个至高天神的绝对真理，大汗就是在他之下保持对他辽阔领域的统治，并且必然压制对该统治权的反抗，不仅把这当作是叛逆，而且当作是严重的渎神。鲁布鲁克首先报导，后来马可波罗又予以证实的另一

件奇特的事,是有关纸钞的使用,欧洲在几个世纪后才采用,但当时中国已普遍流通。中国人书写的特殊字体和方式,我们也是从他那里知道一些概念,他说,中国人并不是跟我们一样用笔写,而是用小毛刷,像我们画家所使用的,而且用一个字或图形表示整个的词。

他还详细地谈到一种叫做忽迷思的烈性饮料,描述如下:“他们称作忽迷思的饮料,那是马奶,制作方式是这样。他们在两根牢牢立在地里的竿上系一条长绳,并把他们要挤奶母马的小马栓在这根绳上。这时母马前来站在小马的旁边,温驯地让人挤奶。而如有一头很难制,那有人把它的小马领来,放在它下面,让吸阵奶,然后马上再把小马牵走,另一个人前来挤这头母马的奶。采集到大量这种奶(其甜若牛奶),趁它新鲜,他们把它倒进一个大囊或袋子,并且他们用一根专用的棍子击打所说的袋,棍的下端有一个像人头的节,它中心是空的;当他们击打它时,它开始像新酒一样发泡,并且味道酸辣,他们这样击打它直到它产生奶油。这时他们品尝它,微带辣时便喝它;喝时它像葡萄酒一样刺激人舌。在一个人喝了一口后,它留下一种杏乳般的味道,舒畅地下肠,使头脑微醉。还有哈刺忽迷思,那就是黑忽迷思,供大贵人饮用,他们制作它的法子如下述。首先,他们击打所述的奶直到它的混浊部分像白酒渣一样径直沉底,清纯部分留在上面,像奶清或白葡萄酒。所说的渣滓很白,给奴仆饮用,使他们睡眠特好。清纯的给主子饮用,它确实非常甜并且是有益健康的饮料。”^②

然而,这有限的消息报道,尽管因日期在先而有其价值,跟那个一度受辱骂,但现在极受尊敬的地理探索先驱者马可波罗所作的详尽而几乎同时代的记述相比,显得不足道。在现今这个进步的时代,当增多了的便利条件,为世界知识揭示出遥远国家及其居民的特征时,我们可以公道地评价六个世纪前敢于描述这些看似异闻的人,他们的勇气和

忠实,但在同时我们能够原谅那些持怀疑的人,他们把这些看成是夸大的和无耻的杜撰。确实,我们也不能想像到任何国家和民族,有关其记述没有得到很多人反复观察的证实,益加被视作可疑和难以置信;而其本身的特征,一旦被证明属实,反成为早期撰述者可靠性的首要证明。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是威尼斯人,在1254年赴鞑靼地区作生意;对这个繁华大城的贸易事业说,到东方去探索,并进口它的贵重华丽产品,具有特殊的引力。马可在他父亲离开几个月后才出生,但两兄弟返回时他已是十五岁的青年,热衷于他们有趣的离奇远游。他们越过黑海到亚美尼亚,从陆路旅行到叫做巴尔巴(Barba)的大鞑靼君长的宫廷。他们受到他的厚待,能够有利地售卖他们的货物。然而,在他的都城住了一年后,他和邻国君长之间发生一场战争,旅行家们因此受阻返回欧洲,他们遂采取环绕里海上部的道路,这样穿越哈拉克(Karak)沙漠到达布哈拉。

他们在那里住了三年,这期间他们得到鞑靼语的知识,然而他们跟随一个赴鞑靼大汗忽必烈宫廷的使团,旅行一年后到达那里。这位强大的君王给予他们仁慈的接待,并且好奇地询问有关欧洲和基督教的事。他了解到教皇是欧洲最受尊敬的人物,便决定派他们作为他的使者去见教皇陛下,请求他派人来教导百姓归依正教。他们在他印玺的庇护下出发,继续他们越过亚洲的旅行,在1269年到达威尼斯。在这时教皇位置空缺,兄弟俩在威尼斯等了两年到它被填补上。最后,格里哥利十世登基,他们得到他的信札,携带礼物出使忽必烈汗,并携现已十七岁的年轻马可同行,还有宣教会的一名修士作伴,他们再度前往东方。他们在亚美尼亚一个叫做基札(Giuza)[阿雅思(Ayas)]的港口登陆,但发现巴比伦算端正在跟该省打仗,两名修士感到害怕,就返回故乡。尽管这样,三名威尼斯人仍继续他们的行程,用了三年半时间穿越

亚洲,经受了无数危难和苦难,终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他很喜欢他们返回,而马可成为他的大宠信,被汗派往遥远省份去执行各种重要任务。在忽必烈宫廷居住了十七年后,三名威尼斯人渴望返回他们的故里,最终获允随同印度王的使臣,后者是前来为他们的君主请求娶王室公主的。从印度洋走了一年半,他们才到达一个叫做阿鲁浑(Argon)的印度王宫。从那里他们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在1295年最后抵达威尼斯。

这就是马可所述的三个波罗旅居异国记。他们在阔别二十四年后带着珍宝和财物返回,这期间他们已有很大改变,以致只有展示他们的财物才可以取得他们亲属的承认。由此,马可得到百万富翁之名,他曾在威尼斯住过的房舍,到拉木学时候仍以“百万富翁宅邸”之名而为人所知。不久后,威尼斯得到消息说热那亚人的一支强大海军正在逼近,于是马上有许多船只被装备起来对抗热那亚人,马可波罗被任为其中一艘的指挥。在随后的战斗中他落入热那亚海军大将兰帕·多利亚(Lainpa Daria)之手,被送往热那亚关押,我们全靠这一有利条件才保了他行纪的一份永久记录。他在牢里关了四年,但热那亚贵人们对他有刺激的历险记产生兴趣,所以他们让他根据他的记忆和口授撰写他的旅行纪。因此在热那亚的监狱里,他的朋友和同伴,皮萨人鲁斯蒂契罗手录了他口述的行纪。后来他重获自由,但他以后的情况几乎不为人所知。

他行纪中最有兴趣的部分,肯定是对中国的记述,他把中国称之为契丹和蛮子;前一名字,我们已提到,指的是该帝国的北部,后者指南部。北方契丹国包括忽必烈汗的驻地,而南方尽管被征服,还没有完全被纳入由忽必烈的祖先,著名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几乎无边的鞑靼国内。

波罗进入中国的路线是沿北部边境,马尔斯登先生是这样谈

的：——“我们的作者抵达中国北部边境，提到两个在所谓长城以内的地方（Succiur，今肃州，Kampion，今甘州）后，就停止继续走直线，而是往下谈到在南和北的地方，其中一些在附近，另一些在远方的鞑靼地区，根据的是他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有关它们的情报。他也没有接着提供明确的概念说明在进入中国后，他和他父亲及叔父赴帝廷之行所采取的路线，尽管有理由相信，他是从甘州到西宁，在那里进入从西藏到北京的大道。”然而，在抵达后一城市前，他们访问了哈刺和林，鲁布鲁克访问时已提到它是汗的领域内的都城。马尔斯登先生说，这座城市是成吉思汗之子和继承人窝阔台大约在 1235 年建筑的，其侄蒙哥可汗把它作为自己的首府。几个世纪来没有它存在的遗迹，但它的位置在耶稣会士和 Danoille 的地图上有著录。不过，莱诺尔德·福斯特（J. Reinhold Forster）根据费希尔（Fischer）的《西伯利亚史》，指出，应在鄂尔浑河东岸去寻找它，而非如 Danoille 把它置于翁金河即翁金沐湫畔。

因为尼哥罗和马菲奥·波罗作为忽必烈之使者离开中国后已有很长时间，所以他们已被遗忘，但一当这时外出的汗听说他们到达哈刺和林，他就下令优礼接待他们，并送他们去见他。年轻马可的容貌给汗很深刻的印象，他立即把他置于自己的特殊保护下。马可勤勉地学习鞑靼语言和习俗，在完成汗分派给他的各种要务中展示出他的智慧和才干，使他很快得到这位开明君主的器重和宠信。当汗迁往 Khanbalu，即汗八里（汗之城），据信即今北京时，马可也随同前往。这座城市被认为在壮丽方面超过他所曾见到的一切东西。宫殿的面积包括一个每边长六英里的四方广场，此说和事实出入不太大。然而，在这个范围内有皇家的武器库，及田地和草地，养育有各种猎物。宽大殿室的屋顶盖有华丽的金箔，绘有鲜艳的色彩，而在四壁刻有龙和战争的图像。宫殿的北面有一座山头，叫做绿山，四围约有一英里，生长着从帝国各地采集的